

我和北大师兄潘承洞

潘承洞师兄是1952年成为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的学生,1956年毕业考取闵嗣鹤教师的研究生,1961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山东大学数学系任教。我是1955年考取北大哲学系,1958年调出哲学系任教,1958~1961年在中央党校自然辩证法研究院学习,1961年毕业回北大任教,1962年调山东大学任教。我们两人的经历几乎一样,所不同的是潘兄早考上北大,早到山大,所以潘承洞是我的北大校友,也是山大的校友。

到山天后,我爱人杨桂鸾1963年也调入山东大学。我们曾在一号楼安家,我家的隔壁就是潘承洞的家。因此,我们相识相知。那时,潘承洞的爱人李淑英,在山大老校物理系上班。临走时,总是嘱咐潘看好炉子,以便回来做饭。潘承洞研究数论入迷,头脑很难他顾,所以家中的蜂窝煤炉经常灭。煤炉灭了,李淑英回来就很难做饭,经常埋怨老潘,说连个煤炉都管不好。没办法,只好从我家煤炉提一块煤,或续烧一块蜂窝煤,以解做饭之困难。

对于这个问题,有一次我开玩笑说:“老潘,你这个大数学家,怎么连蜂窝煤炉子都管不好呢?管蜂窝煤炉,只有两个函数,一是蜂窝煤的大小,二是烽火盖口缝隙的大小。缝大燃烧快,缝小燃烧慢,你把缝隙大小定得适当,煤燃时间就可确定。到做饭时,燃烧正好,打开即可做饭。这么简单的数学问题,你为何反而做不好呢?”老潘听着,点点头,说:“你说得对,我也懂,就是心不在焉。我在研究问题时,忽然想起炉子,跑过去加煤。有时因正想着数学问题,加煤后,忘了加盖,煤很快烧完,炉子也就灭了。”潘说后扭头进屋,又去数论海洋畅游去了。我怀着崇敬的心情,看着老潘的背影,心想:老潘不入迷,岂能攀上哥德巴赫猜想的高峰。

由于受学哲学的影响,也由于钱学森在北大讲演时特重视方法的启示,我有段时间专门考虑方法问题。我认为一个人聪明不聪明,关键在于方法,一个人成功不成功,关键也是方法问题。有一次,我向老潘请教哥德巴赫猜

想研究成果与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法的关系,他说:“你问的问题很好,这是个关键问题,因为有了新的研究方法,才获得新的研究成果。我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与前人不同,我用的是‘筛法’,我用了这个方法,才使我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上前进了一大步。”我详细问“筛法”,老潘简单说了说。我不是学数学的,也没弄明白,但对我认识成果和方法的关系有很大帮助。后来,我写了篇文章,题目是《方法孕育成果》,就是受老潘的启发而写的。在文章中,也谈到承洞兄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成果与其所用“筛法”的密切关系。

当时,我任山东大学办公室主任,又兼代博士生的自然辩证法课。那时山东大学只有四个博士生,其中一个就是潘承洞兄的研究生,名叫展涛。这四个人皆必须学自然辩证法,课由我授。当时没有博士生的教材,由我定学习内容。我刚出版《大杠杆——震撼社会的新技术革命》,就拿此书作为教材。我很少口讲,由他们自学,然后讨论,最后由我总结答疑。他们对这门课非常满意,读后收获不小。这4个博士生由展涛当班长,我要求博士们在我上课前必须擦好黑板,扫好地。展涛都做得很好,我还夸奖了他。我认为上课前擦好黑板、扫好地,虽是小事,却是尊师爱生的大问题。有一次,承洞兄碰见我,问我展涛表现如何,我说:“表现不错,他很尊重老师,遵守上课纪律,老师交代做的事都认真去做。”他说:“那好,有什么问题,你不要瞒我,告诉我,我们共同教育他。”

1982年,承洞兄患病住院。我去看他,问其病况,他告诉我,大夫没检查出大毛病,就是低烧不退。我也没当回事,只是劝他安心养病,回校后再闲谈。1983年,山东省立医院影像所所长连世海到山大送人学计算机。由于山大为其提供了帮助,连所长为表感谢,提出为山大教师免费做一次检查。也就是在这次检查中,发现承洞兄得了直肠癌。手术很及时,也很成功,承洞兄又恢复了健康。要不是连所长,承洞兄仍在医院久拖,后果不堪设想。

无巧不成书。我和潘兄又同时得到任命,他被任命为青岛大学校长,我被任命为青岛大学副书记、副校长。当时,在山东大学抽调两人,一个是我,一个是潘兄。另外在山师、山工各调一人,齐赴青岛,援建青大。潘兄虽任校长,但平时不常去,只在开学典礼时去青岛讲讲话,与师生见见面。重担在我身上,最初我分管的工作很多,连人事工作都分管。如何办青大,我和潘校长意见一致。例如:建校时,要特别注意引进高质量的教师;办好大学起点要高,既要有教学人才,又要有科研人才;力争教学科研双丰收,提高青岛大学的知名度;等等。我们意见一致了,事就好办了。遇到阻力,事难办时,我就说,潘校长也有这个意思。有疑义者,持反对态度的人,就不好再固执己见,妨碍工作。因此,我在青大,工作顺利,颇有成效,与潘兄大力支持

是分不开的。

1987年,省科技召开全委会。当时,曾呈奎是科协主席,潘承洞是科协副主席。我在青岛,早晨赶路,奔赴济南,参加会议。到济南后已近9点钟,会议已经开始。由曾老作报告,潘承洞在主席台坐着。我一进会议室,就朝着主席台摆了摆手,一是致意,二是致歉。当我摆手时,潘兄也朝我摆了摆手,表示回应。曾老报告完毕,会议中间休息,我就到主席台看望曾老和潘兄。曾老是青岛大学顾问,潘兄是青岛大学校长。我去看他们,也表示我们的情谊。看到潘兄时,潘说:“你什么时候来的?怎么没有看到你。”我说:“我来晚了,进门都给你打了招呼,你还摆手致意呢?”他说:“我看到一个人进来,向主席台摆手,我顺便抬手致意,没看清是你。”说罢,我们俩都哈哈大笑。这时我才想到,潘承洞眼睛近视,有一千多度,平时看不清人的。看不清就打招呼,说明潘兄确很礼貌,不摆科学家的架子。

三年后,即1990年。我赴烟台,任烟台大学校长。潘兄任山东大学校长,不再兼任青岛大学校长。从此,我们分隔两地,忙于办各自的大学,就很少见面,很少畅谈,很少再续我们的故事。

1997年,潘承洞师兄因病去世,时年仅63岁。潘的逝世,使我们国家失去了一位大数学家,也使我失去了一位相处30年的师兄,是国家的一大损失,也是我的一大损失。去世时,开告别会,我因在外地,无法赶回,未能参加,是一大憾事。问及参加告别会的好友,大家告诉我一些情况,我心稍慰。其中有一副挽联,特别动情,也代表我的心意,记录在此,以兹纪念:

绝顶天慧翔游数论王国推出科学猜想惊寰宇
超常决断优化教育因材施教就轶世英才遍五洲